

余习厂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半集



余习广 主编

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娅丽

装帧设计：贺旭柏 端

00636
5.6

位卑未敢忘忧国
——“文化大革命”上书集

余习广 主编

责任编辑：王娅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1989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6 插页：2

字数：341000 印数：1—31610

ISBN 7—217—00636—8

D·74 定价：5.65元

序 言

当科技革命的浪潮在全世界汹涌澎湃之时，“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却淹没了中国：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一挥手，亿万红卫兵和中国人高擎“红宝书”热泪滚滚，“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狂呼声如雷行长空，惊天地，泣鬼神；毛泽东一声令下《炮打司令部》，上至国家主席、委员长、部长，下至厂长、生产队长，统统被“打倒”；“敢闯、敢干、敢造反”的红卫兵，以“破四旧”、“砸烂封、资、修”之“壮举”，使神州名胜古迹捣毁殆尽，中外图书典籍付之一炬；“文攻武卫”、“全民皆兵”，大刀、长矛、狼牙棒遍地挥舞；大炮、飞机、坦克声满天轰鸣，从川、黔、湘、鄂、鲁到陕、甘、新……到处是武斗、混战，参加的人上万到几十万。广西庆功宴吃的是人肉、人肝；广东、山东“语录牌”下示众的是人头、人尸；派斗、武斗、“斗私批修”，夫妻分道扬镳，父子反目成仇……“文化大革命”，山河流血，国将不国。

然“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中国历史几千年，外患时起，内乱丛生，隔二、三百年，便来一场改朝换代的大变乱，天翻地覆。中国历史千年不绝，就在于中华民族有那么一种文化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起一代又一代壮烈千古的仁人志士，在民族、国家危难之时挺身

而出，倡大义，平天下，拯救江山与黎民苍生。这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是中国历史相续之根，正是中华文明立世之本。

“文化大革命”，又见千古风流之英雄本色。在一片红色狂潮之中，一批又一批有胆有识、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舍身取义。他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上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或诛祸国殃民的奸臣后党，力谏“伟大领袖”发动“文化大革命”误国误民之失；或献治国安邦的复兴良策，呈富民强国建设现代化新中国的宏图大略……以拳拳赤子心，竭尽绵薄之力，挽狂澜救天下。

封建王朝为江山社稷，尚以科举制容天下士子做策论纵议天下治平之道。然人民共和国的“文革”时代，天下兴亡之事为中央少数人和“伟大领袖”战略决策的专利，上书直言国策为“大逆不道”，罹不测之祸甚至担杀头的风险。有人说，在中国，真理往往是一首残忍而美丽的诗，唯有鲜血淋漓的灵魂，才能勇敢正视真理；唯有血写的文字，才足以表达真理的内核。又有人说，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为宝贵，前进的事业终将为前进所代替。是真豪杰者，敢为人民苦难浩劫长歌当哭，敢为国家民族命运甘使一腔热血如急雨飘洒，方显出中华儿女壮烈英逸之气概。举国之人，倘皆能如此克尽公民之责，中国当可为共和之国！时势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先知先烈的思想为国民大众所认同，历史时势就不可逆转地扼住了“文化大革命”的咽喉；中国社会才摆脱浩劫，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走向共和的人民主权。

收集上书，有幸结识了一批能够引为自豪的上书者为朋友。历史从昨天走来。中国社会如何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是我们共同关切的主题。现代化最根本的危机在于：现代化与国人失落迷惘情绪的冲突。今天，现代化事业不再是鸦片战争以来百多年间硝烟弥漫的民族战争。民谣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朝钱看”和“捞一把”日渐冲击和淡化着民族责任意识和使命感。中国文化倡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模式，随国家、民族责任感淡化而日渐消失，养身发家成为不移之道。人们把现代化只是当做增进家庭天伦之乐的物质手段。现代化，在一些人心中沦落为“彩电、冰箱，高级音响……”；在另一些人心中，则等值于“高级宴会、豪华楼堂馆所、超豪华小汽车……”。这或者将是中华民族失去本世纪末最后一次腾飞机运的现实危机。纵观世界历史，现代化是一个苦难与悲壮共生的历史进程，决不是醉生梦死，燕舞莺歌！现代化与悲壮的民族使命感，注定将是中华民族创业时代的主题。迎接新的科技革命挑战，把握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中国的未来，现实地握在每个中国人手里。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需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精神，需要社会精英负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冲动和创造，需要全民族振作精神，自尊自信，艰苦创业，奋发图强！

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走来。“鉴往知来”，中华民族亟需从对“文革”的深层反思中吸取经验教训，寻找斩断传统社会动荡循环之链，走向现代社会的思路。本集奉献给读者的，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一批富于思考精神，敢于向中国社会传统命运挑战的志士们的上书原件及相应资料，具有极珍贵的文献价值。在这里，思想勇敢翱翔，为中国和世界寻求更广阔更深沉更自由壮丽的时代。

毋庸讳言，在“文革”时代写就的上书之中，个别篇章

和观念还有一定的时代色彩和局限。但瑕不掩瑜，真理的内核华光千秋！

本集收入的上书，一般都征得了原作者或其亲属的同意；上书大多来自当年案卷原件。为了保持上书的原貌，在选编过程中，对上书从内容到文字均未做变动，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余习广

1989年元月 于颐北

目 录

序言	(1)
萧瑞怡上毛泽东书	(1)
附（一）：通缉令	(19)
附（二）：中共新化县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的推 荐信	(20)
附（三）：我的上书回忆	(22)
附（四）：共产真义说 ——致中共中央、全国政协常委会书	
 萧瑞怡 (35)
王蓉芬上毛泽东书	(52)
附：女政治犯	戴晴 洛恪 (52)
伊林·涤西给林彪的一封公开信	(75)
彭德怀致毛泽东最后一封上书	(83)
附：彭大将军的最后岁月	胡思升 (87)
章士钊上刘少奇书	(100)
附：父亲章士钊上书纪实	章含之 (103)
姜明亮等上中共中央、毛泽东书	(121)
刘振武的两封上书	(132)
周培源上周恩来书	(167)
附：周恩来对周培源来信的批语	(170)

李庆霖上毛泽东书	(172)
附：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	(177)
王若水上毛泽东书	(178)
附（一）：毛泽东关于批林是批极左还是批右的谈话	(184)
附（二）：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王若水	(184)
白智清上周恩来书	(205)
白智清上李德生书	(207)
白智清给江青的信	(208)
白智清上叶剑英书	(209)
白智清上邓小平书	(210)
附（一）：给同志们介绍两篇文章 白智清	(216)
附（二）：我爱我的祖国 白智清	(218)
附（三）：试问，到底是哪家的“主义”？ ——评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白智清 (220)
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李一哲	(229)
附：广东省召开群众大会为李一哲错案平反	(266)
张天民上邓小平书	(269)
附（一）：毛泽东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	(273)
附（二）：文化部核心组对《创业》影片的意见	(274)
附（三）：影逢乱世：《创业》蒙难纪实 乔迈	(278)
献国策		
——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李天德	(382)
附：九死一生献国策 叶永烈	(400)
朱锦多关于张春桥、江青等人问题上毛泽东书	(417)

附：多难之邦忧国难.....	朱锦多	(420)
刘冰等4人就迟群、谢静宜问题上毛泽东书.....		(425)
附：毛泽东关于刘冰等人上书的谈话.....		(440)
对目前形势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几点看法		
——给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信.....		
.....	李洪刚等7人	(441)
附：迎接光辉灿烂的新时代	肖应荣等	(488)
后记		(501)

萧瑞怡上毛泽东书

敬爱的主席：

我是湖南新化一中的学生，本身的地位就已经够谦虚了，但我总想做一件不谦虚的事。我不能让思想永远谦虚下去，永远束缚在牢笼中，而想大胆解放出来，让我积压的思想浩荡奔流。

我想，一个国家也象一个家庭一样，儿子可以向老子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家庭搞好；同样，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国家的弊病，也可以向自己的主席提意见，献主张，以便将国家治好，我的上书就是秉着这一愿望而出发的。

我上书的内容有下面六个方面。自知是冒了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今日是歌功颂德的时代，岂敢上书，指点弊病。但我想，假使世界上的人，特别是青年人，都是些谦虚的人，那么，我们的社会岂不成了少数人的社会，国家岂不成了少数人的国家？！

一 改革土地制度

土地，乃国民衣食所依。什么样的土地制度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达到多产粮食的目的，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性质状况，则能促进生产力，否则将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的关系犹如物和秤砣的关系一样。物有三斤重，砣就要放到三斤处，物有两斤重，砣就要放到两斤处。砣的位置随物重的位置变化而变化，使之平衡。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正是根据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实行变革的。生产力决不可迁就于生产关系，正如物决不可迁就于砣一样。

唯心主义者总是强调精神的作用，强调生产关系的作用，自制美好的理想世界，强迫客观世界按他的理想世界转，强迫生产力按他设想的生产关系转。这恰如强迫太阳跟着地球转一样荒谬。

解放快二十年了，为什么我国的农业迟迟不发展？为什么农民终年劳累却不能饱肚？人乃万物之灵，山野中尚且牛马都可生活，为什么人倒为生活着愁？这不能不追究到生产关系的变革不适应生产力的问题上来。

我们来看以下几个阶段的过渡。

从土地改革时期的单干生产形式过渡到互助组，从互助组过渡到低级合作社，再从低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再从高级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生产关系的变革一级高过一级，可生产力并没有多大发展，土地改革单干时期农民用的是锄头犁耙。如果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不因为生产力的实际状况而实行变革，那为什么不趁土改之时马上搞集体呢？土地改革单干生产形式又有什么必要呢？

再就生产力中劳动者和生产工具而言，劳动者本身是生

产力中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因素。劳动者是有灵魂的动物，肩膀挑东西，手拿锄头生产都是由他的思想指导的。要怎样才能把劳动者的智慧和力量全部发挥出来？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起首要决定作用的因素来一番探讨。我认为酷爱自由是人的本性。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也是人的本能。一个和尚担水呷(吃)，两个和尚抬水呷(吃)，三个和尚没水呷(吃)，这在人们看来，可以作为笑料来谈。可是一个家庭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分家，而且这也成为几千年来历史习惯。为什么一个娘肚子出来的人难以共一个锅吃饭，同一块土地劳动，这究竟是什么道理呢？我们曾经将人理解为圣人，组织大家一块儿到公共食堂吃饭，又一块儿到地里劳动。社会实践的结果，十六元钱一斤的肉，一块钱一个的鸡蛋，人们啼饥号寒，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论人的道德，要不要讲一点物质基础呢？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对工人的慈施，最后自己沦为无产者。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处处为他人着想，事事吃苦在先，世界上有几个呢？我们可不可以拿他们的高尚思想代表全人类的共同思想属性去研究经济领域里的生产力呢？你拿锄头犁耙生产，我也拿锄头犁耙生产，你是喜欢互制条约协作生产，还是喜欢独立自由地生产呢？这些是值得我们多多思索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定历史阶段人的思想都是此阶段经济形态的产物。具体地说，生产工具决定人的思想。为什么原始社会会出现氏族公有制，是因为当时生产力极其低下，一个人拿着木棍和石头无法单独与猛兽和自然界作斗争，因而决定原始人必须集体捕食，共同分配劳动果实。但这个集体的性质范围是极其狭小的，只能是一个女人的子孙。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人们可以单独进行生产活动的时候，氏族公有制也就随着瓦解，社会就进入了私有制

——奴隶社会了。可见，原始人搞集体是一种自然的制度。蜜蜂喜欢集体采蜜，集体生活是蜜蜂的自然而然的性质；鸭子喜欢在水里生活，不与鸡犬同道，是鸭子自然而然的生活性质。同胞共乳的兄弟尚且难以共一个锅吃饭，同一块土地劳动，我们却偏偏要将张三、李四、王五等在今天这个锄头犁耙时代组合成集体一起劳动，共同分配，这就违背了人酷爱自由的性质。

为什么土地改革单干生产农民自由舒畅，粮食堆山积海？当时三分钱一个鸡蛋，四角钱一斤猪肉，黑市谷价与国家牌价差不多，农民从内心里喊出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为什么1960年先后两年农民啼饥号寒，以至于为了一点东西两口子分家，父子分家，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了呢？为什么搞三自一包、借田借土，立刻将灾难的局面拯救过来？为什么过去一个长工耕作一亩田花工不上二十个？为什么现在耕作一亩田花工一百个还不止？为什么过去农民半年辛苦半年闲，而今一年四季，累如牛马，工夫无休无止？为什么现在左斗右斗，千批万批，将农民当作农奴一样箝制在集体，劳动工价总是三角、四角，有的甚至只有一角多，日夜为肚子发愁？查其根源，无非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应不适应的问题，即土地制度是解放劳动力还是束缚劳动力。当今的农民对集体生产制度的看法无非将它认为是束缚自由的桎梏。他不知道土地是谁的，等于是丧失了土地，因而他不知道是谁在那里生产，吊儿郎当，窝工（浪）费。可是不论是谁，一走进自留地就命都不要了，发挥出了全部智慧和力量，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意识到此时的劳动是全部属于自己，感到这时的劳动有无穷的劳动乐趣。

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较之资本主

义国家有无比的优越性，那就是生产资料全部属于国有，可以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但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切经济形态共有的经济规律。自制美好的社会蓝图，一定要生产力来迁就生产关系，务必造成空想社会主义和贫困的社会主义。按人所设想，农民自留地没有了，资本主义尾巴全部砍掉，等于是破釜沉舟，农民应当安心于集体生产了，可是实践的结果总是事与愿违，恰得其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曾经就个体生产转变成集体生产有以下的论述：“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能设想用强制的办法剥夺小农（有偿或无偿都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待小农的任务首先在于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协作社的，但不是用强制的办法，而是通过实例和提供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此处，恩格斯就把私人生产和私人所有权变成协作社时，讲得很明白，提出不要用强制的办法，要通过实例和社会帮助来达到这一目的。所谓实例，就是国家要建设一些国营农场，使之成为高度机械化和高度商品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榜样，使人们深信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巨大优越性。所谓社会帮助，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农业科学技术，为农村提供足够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适应集体化生产的机械设备，没有具备这些物质条件，要使农民自觉自愿走向集体化道路无非是空想，无非是使用压力拼凑，而人为的集体制度也是不能巩固的。我想，农业生产机械设备真的具备了，农民亲眼看到了机械生产效率果真高于手工劳动几倍，相信此时的农民再不会奴隶般依恋他的单干生产，死守他的锄头犁耙不放，而会自觉自愿组

织起来购买机械生产设备集体经营生产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一条规律，无所谓“改造小农经济”而言，因为这种单干到集体是自然而然的过渡。资产阶级之所以都把一系列个体生产单位变成社会化的集体协作形式，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纺纱机代替纺车，没有机动织布机代替手工织布机，则个体生产单位不会自然消失。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先进的生产关系。没有母体，就没有婴儿。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没有先进的农业机械设备，就不能有先进的集体生产方式，这是毋庸置辩的真理。

那么，什么样的土地制度才适应目前农业生产力的性质状况呢？我想，借田借土的土地制度最为适宜。

借田借土制度的内容是：在现有人民公社的制度下，以生产队为单位，根据人口的多少，劳动力的强弱，合情合理地借给各户耕种。既然是借，自然土地是属国有，各户只有耕种之权，决无买卖之权。而集体有调整分配土地之权，三年或两年后，根据人口的增减，劳动力的变化，重新调整。集体或国家因为公共事业要占用土地，则可及时调整。国家分配的公粮任务由队领导核算到户，再由各户交出来统一完成。五保户全部由政府负担。至于现在生产队的耕牛、农具之类，应根据各户自愿组合成几个小单位抽签分配，尔后任何人增办的生产工具、耕牛则属私人所有，将来具备了集体生产的机械设备时，各户再自愿组织成集体，但在进集体时，各户的私人生产资料应当按质按量换算成钱兑现到户。

如果这种土地制度一实现，则亿万农民欢天喜地，他喜得可在田里打几个滚，因为他知道这时的劳动是完全属于自

己了。实现了自己的劳动志趣，力量会全部使出来，劳动力达到了真正彻底的解放，自然生产会猛速发展，粮食会巨增，我国将立即进入黄金时代。

不过，借田借土制度也不能一律实行于全国各地，因为各地的主、客观条件是有差异的。有的平原地区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的，那应当搞集体（不过，大单位也要化为中、小单位，以便于经营管理）。有些地方如果搞“三自一包”则搞好“三自一包”。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土地制更适合于本地的条件，就搞他们的土地制度。但总的来讲，根据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应采取借田借土的制度为主。

可能有人担心，这样多样的土地制度太杂了。我们认为土地制度杂没有关系，因为总的来讲，土地国有是个总纲，杂为的是发展生产，多产粮食。列宁讲过：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有一般，又有特殊。

可能有人要说，这种单干生产会出现两极分化。我想两极分化是不会的。要求人的生活平等是我们提倡的主义。但是由于各人能力的差别和其他条件的差别，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平等，却是一个真理，我们不能单提倡主义而丢掉了真理。不能单考虑平等而置生产力性质不顾。应该明白，借田借土制度是由当今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它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况且各户田土分配差不多，人人又有双劳动的手，生活差别也不会太大。

也许有人要说，集体力量大，单干力量小。我想，搞农业不是打老虎，打老虎要人多。土地是分散的，死的劳动对象，一个人、一条牛就可以耕作。播种一个小孩即可，农村不象工厂一样，工人由于机器的生产不能不是集体的有机操作形式，而农民用的是锄头、犁耙，它并不需要你拿锄头上